

第一章 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幻觉与现实

俄罗斯在建设资本主义吗？

1985 - 1990 年改革的失败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极度的失望和不满，也使戈尔巴乔夫的班子中的改革者们惊惶失措。他们当中有些人打算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口号。取代尼古拉·雷日科夫的新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后来承认，早在 1990 年他就坚信：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拯救俄罗斯。因此，他曾就此同美国领导人和“良心呼唤”基金会主席施奈德牧师进行过秘密的会谈。^①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未来的组织者们进行同样秘密的会谈。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告失败、苏联共产党消失、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连同他的班子的残部撤离克里姆林宫——这一切事态所产生的结果是：反对原领导人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新政治力量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们把 1991 年秋天的事件称之为革命。他们把这一事件说成是一场“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民主的”、“反极权主义的”

^① 《今日报》，1994 年 11 月 29 日。

甚至是“民族解放的”革命。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权势官僚革命”或“犯罪革命”。但是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革命。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为庆祝俄国“第一届改革政府”成立六周年而在一家报上撰文写道：“六年前俄罗斯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人们没有道破这一点。”^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可能是一个策略问题，或者是一种企图蒙骗国民的一个手段而已。人民大众支持 1991 年的自由和民主口号，他们反对权势官僚的特权和权力，希望借此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但是，无论在每一次支持叶利钦的群众集会上、在那些“打倒戈尔巴乔夫！”“打倒苏联共产党！”的标语口号中，我从未看到“资本主义万岁！”“政权归新资产阶级！”的标语口号。当然，在不同的国度里，人们对许多概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波兰的瓦文萨在夺取政权之前曾经宣称：“我们将实现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最近几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一个新的口号：“为人民、为劳动人民建立资本主义！”但是，在 90 年代初期，我国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人民资本主义”这个口号。

叶利钦本人在历次纲领性的演说中，也从未说过要把“资本主义”当作他在俄国推行“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虽然他离开这一目标已近在咫尺。早在 1991 年叶利钦在纽约大学的演说中曾说：“俄国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②五年以后，也就是在 1996 年，俄联邦总统在致联邦议会的咨文中指出：“那些希望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之间为俄罗斯的未来寻求答案的人们所持的观点已经

① 《今日报》，1997 年 11 月 5 日。

② 《真理报》，1991 年 7 月 9 日。

完全过时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反对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已不存在了。”可是，一位具有新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则坚决表示，叶利钦在大选中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乌柳卡耶夫这样写道：“1996年的总统选举是一次历史性的和决定命运的事件……就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谁战胜谁？’的问题在俄罗斯因选择资本主义而获得了最终解决。”^①

然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却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提法。他早在1993年就曾说过：“主要的问题是我要告诉那些到处叫喊似乎俄罗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我们不会把俄罗斯引向任何资本主义。俄罗斯不会是社会主义，也不会是资本主义。”^②他在两年之后又解释说，“我们将建成一个崭新的、没有任何‘主义’的社会。”^③

某些作者关于原有社会的“制度性转换”的看法也是含糊其词。新政权的首席理论家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对新政权目标看法则坦率得多。他说：“我认为，改革的社会经济目的可以表述为：建立私有制制度。人人都应生活在一个可以获取自由而无风险并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近一千年来人们并未想出比这更合乎人性的制度。它并不理想，但是正常的。”^④

叶戈尔·盖达尔1992年充当俄罗斯政府首脑后也回避使用

① 《今日报》，1996年9月20日。

② 《论据和事实》，1993年第42期。

③ B·索格林：《现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1994年》莫斯科1994年版，第118页。

④ B·索格林：《现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1994年》莫斯科1994年版，第118页。

“资本主义”的提法。他谈什么“货币主义”、“激进改革”、“把俄罗斯融入文明的市场国家共同体”。但是，当那些支持政府的报纸和刊物把他称为“俄罗斯资本主义建设者”时，他并不表示反对。譬如，早在 1992 年《生意人》杂志在谈到盖达尔时曾这样写道：“一些人说他是位英雄，另一些人则把他称为民族利益的叛徒、世界帝国主义所收买的间谍。但是，不管是骂也好，是捧也好，叶戈尔·盖达尔本人却豁达大度，处之泰然，而且为了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照样一天工作二十小时。”^①又过了两年，历史学家、时评家维克托·邦达列夫在一篇题为《斯托雷平和盖达尔》的文章中写道：“我国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隔了整整一个世纪，斯托雷平和盖达尔做的实质上是同一件事情：建设俄国的资本主义。”^②

1994 年 9 月 13 日《消息报》在一篇文章中善意地分析了盖达尔如何谋求加强“俄罗斯民主选择”党的地位，并给这篇文章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盖达尔的党将沿着列宁的道路夺取资本主义最后的胜利”。实际上，盖达尔本人也不再去设想什么新的提法。他在一次同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对背的论战中指出：“我们现在建设的资本主义还年轻，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的、有秩序的和立奏奇效的。新的资产阶级在它的初始时期也将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年轻的资本主义还很不讨人喜欢，很不完善，但它侥幸地避开了共产党反对改革的危险，现在要做的仅仅是把它引上文明的道路，为此就必须进行一轮新的自由主义的改革。”^③盖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初，许多部长更为

① 《生意人》，1992 年 7-8 月，第 80 页。

② 《祖国》，1994 年第 6 期，第 52 页。

③ 尼·雷日科夫：《我来自以俄罗斯命名的党》，1995 年莫斯科版，第 90 页；叶·盖达尔：《失败与胜利的日子》，1996 年莫斯科版，第 365 页。

坦率，他们并不隐讳自己是为建设资本主义而工作。经济部长叶夫根尼·亚辛就曾宣称：“俄罗斯已经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在有效的资本主义、无效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① 叶利钦班子中的年轻改革者们也是满怀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的愿望的。阿纳托利·丘拜斯就说过：“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而且是要在几个突击性的年份中完成世界其他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作。”^② 鲍里斯·涅姆佐夫讲得更加具有批判的味道。他曾多次指出，必须把俄罗斯已经建立的那种强盗式的资本主义转变成“正常的”、最好是“人民”资本主义。涅姆佐夫在答《新报》记者问时曾说：“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这正是我们现在要作出的选择。第一种资本主义是权势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口号是：‘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都属于官僚阶层’。第二种资本主义是寡头资本主义。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属于一个很小的由公司、商界和非官僚人士所组成的阶层……而一条更好的道路……则是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属于尽可能多的人民。我把这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③ 可是，在鲍里斯·叶利钦访问下诺沃戈罗德的时候，尽管涅姆佐夫怎么劝说叶利钦宣布“人民资本主义”为俄罗斯国家思想，叶里钦仍然不作这种宣布。

美国金融家、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在西方不大人把他看作是生意场上行为正派的人物。但是，当他看到“俄罗斯巨富们”采用贿赂手法聚敛民财并参与政治阴谋活动时，也惊讶不已。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

① 《真理报》，1995年10月5日。

② 《独立报》，1997年9月11日。

③ 《新报》，1997年11月24日。

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这位美国大亨对“俄罗斯寡头这种粗暴野蛮和凶恶贪婪的行为”感到震惊。“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索罗斯认为让涅姆佐夫和丘拜斯主持政府就是一件咄咄怪事，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才得以变成合法的资本主义。”^①

在确定“结构改革”的目标和预测其实际效绩的过程中，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是很明显的，也绝非偶然的。它既反映了改革者们对于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的主张不受欢迎的忧虑心情，也反映他们本身的信心不足，这种信心不足是有其重要根源的。盖达尔的一位追随者采用新闻撰稿人惯用的手法，将俄罗斯比作一艘轮船，他说，人民所经受的种种困难和痛苦都是暂时的、不会长久的。一艘轮船要转入新的航向，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要精力集中，准确掌舵。但在沿着新的航向继续前进的时候，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风帆而已，那时不管刮什么风对这艘巨轮及其乘客都将会是有利的。大部分难于应付的航行困难已经过去，而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顺风正吹拂着俄罗斯经济之帆。但是，并非所有的改革者都赞成这种乐观的看法。他们当中有些人则认为，转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航向，在俄罗斯要经历两到三代人才有可能，那些能尝到“光明的资本主义未来”的果实的人，恐怕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孙子辈了。还有的人既不相信看风掌舵的准确性，也不相信船长和他那帮船员，更不相信他们匆匆忙忙扯起的船帆能够经得起风浪，对这些人我就不去提及了。

对于任何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周密考虑的渐进的市场改革纲领和使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休克疗法”纲领，两者是有巨大的差别的。今天，不大有人对这一事实

^① 《实业界》，1997年6月25日。

提出争论了：国家社会主义 已把俄罗斯引入了死胡同，要走出这条死胡同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形式和方法是不行的。将部分国营企业实行合理的私有化并逐步建立竞争的环境，恢复中小企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多种私有制形式，鼓励西方对俄国经济的投资、实现对外贸易的部分自由化，建立合资企业、公司、商业银行、交易所以及市场基础设施的其他要素——所有这一切都是方向正确的步骤。这类工作早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就已经起步了，需要把它继续下去，加以深化，加快速度。在这里我就无需引证中国的成功经验了，近 20 年来，中国的全国生产总量提高了 4—5 倍，十三亿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3—4 倍，甚至对富有种种“经济奇迹”的 20 世纪来说，这都是一个创纪录的成就。对于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我也就无需多说了，经历战争的破坏和占领之后，它们在 25 年之内不仅消除了灾难和混乱，而且进入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强国之列。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成功地进行过市场改革的尝试。柯西金在 60 年代也曾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在 70 年代，政治局曾经讨论过关于在中小城市建立私营服务行业、小型私营商业和餐馆的建议。同亨利·福特第二进行过关于共同建立卡马汽车厂的谈判，同美国“希尔顿”公司进行过在莫斯科建立几家宾馆的谈判。甚至在斯大林时期，在卫国战争年代，当整个国家经济都服从于战争需要的时候，在当局的默许下，国内的小型私营商业以至小型私营生产性企业都开始得到恢复。各城市不仅出现过大型商场，而且也有过各种商店，甚至半合法的外汇市场。开采金矿和金刚石矿的生产合作组织也曾受到了鼓励。但是，这种不公开的“新经济政策”在 1947 年货币改革之后就宣告结束。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苏联社会和苏联经济是需要从根本上加

① 作者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界定为国家社会主义。——译注

以改革的。但是，那种企图在我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大型的资本主义生产企业、也就是在 70 年来形成的苏维埃社会中建立全面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做法，显然是一种荒谬的乌托邦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盖达尔本人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 1992 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被 90 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16 个中央银行代替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营联营的传统，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没有时间再也什么都不做，而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了。”^①

盖达尔在这里把他的读者弄糊涂了。他的班子制订的纲领，只不过是 1991 年底许许多多反危机纲领中的一个而已。在那些支持叶利钦并制定纲领的国家官员和经济学家当中，谁也没有打算“再等了，再也什么都不做”，同时谁也不想“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何况那位未来的总理或者说过去的代总理在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已讲清了那些阻碍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企图在惊惶、混乱和政权危机中推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革的一些次要原因。在俄罗斯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还存在着更严重得多的障碍。

1990 年，盖达尔曾经建议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紧紧地眯起眼睛，向一个不知深浅的地方跳下去。”^② 1991 年，又是那个盖

① 鲍·叶利钦：《总统笔记》，1994 年莫斯科版，第 246 页。

② 《真理报》，1990 年 4 月 16 日。

达尔，他建议俄罗斯的领导者“摆脱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①这样的改革对于捷克、匈牙利、立陶宛和波兰是可行的，因为这些国家只是在 40 年代末期才脱离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根子比 1917 年的俄国要深得多。俄罗斯的资本主义道路既然已经摧毁，甚至一些微小的痕迹也早已消失，到了 90 年代，要俄罗斯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未免有些离奇。

在社会经济形态、或者说人类文明形式的发展方面，存在着一条永恒的共同规律；但是，无论 1917 年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还是 1991 年 8 月以后的激进改革者，对这一规律都没有重视。任何一个社会，或者任何一种文明，不是脱胎于原来的文明或原来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和文明是不可能建成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明不是那种僵化的体制，而是一种有活力的、自我发展的构成体。人们可以帮助和加速社会经济形态和文明的形成，但是它们的植根、树干和枝叶、花朵和果实，只能从有生命的种子和幼芽中生长出来。大家都知道，一种有生命力的制度的发展，取决于内部的规律，而不是取决于立法者和改革者的愿望和努力。因此如果像我们常做的那样，把一个社会的发展或一种文明的建立比之于一艘巨轮的航行，或者比之于房屋的建造，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要做点比较粗浅的类比分析的话，倒可以比作培植花园或者建造树林。我们可以通过施肥、除草、灭害虫、浇水和培土等办法加快树木的发育和成长。但是，无论树林也好，花园也好，不会在两个月之内，也不会两年之间就出现在我们的身旁。

当然，我们可以列举出若干关于导致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失败和使我国人民遭受多年莫名痛苦和无谓牺牲的重要原因，将上

^① 叶·盖达尔：《失败与胜利的日子》第 247 页。

述的泛泛议论加以具体化。我将在下文举出十个原因，或者说十大因素。当然可列举的还不止这些。

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十大障碍

1、“材料强度”^①

盖达尔和他的西方顾问们设想的“体制转换”办法，并不是在类似俄罗斯 1920 - 1921 年、德国 1945 - 1946 年或者中国 1977 - 1978 年经济崩溃和混乱的条件下推行的。通过十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生产和经济体系，这种服务有些地方表现很糟，有些地方平平，有些地方差强人意，而有些地方甚至还很好。问题不单单在于高度的集中和行政命令管理体制，而是在这个体制当中有两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给实物化了；而这两条原理在 19 世纪是可行的，但不适用于 20 世纪的经济现实。

根据第一条原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生产过剩，从而引发周期性危机和失业。这种情况又会造成社会生产力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和无权境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垄断化又将阻滞技术进步，引起物价上涨和经济衰败。这两条都不好，只有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国家计划才能消除无政府主义和危机，才能把集中和垄断的缺点转化为优点。大家知道，在苏联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下实行

^① “材料强度”是指建筑物构件和机器零件等材料抵制变形的特性。这里作者将其引用到对体制的研究上。——译注

的是彻底的严格垄断制，即使在服务领域里也排除竞争。各汽车生产厂家互相之间没有竞争，它们各自生产不同型号和载重量的汽车。不同的钢厂生产不同口径的钢管。立陶宛的电机厂生产一种型号的全部电机、亚美尼亚生产另一种型号的全部电机、库兹巴斯则生产第三种型号的全部电机。整个苏联所需要的纸杯子完全由拉脱维亚的一家工厂生产。一种大家所熟知的橡胶产品则全由莫斯科近郊巴科夫卡的橡胶制品生产企业生产。对某些不可能实现生产垄断的部门，如肉类、奶类或者粮食制品生产部门，则划定销售市场范围，每个企业只能在严格规定的地区内进行销售。

根据第二条原理，大型或者超大型企业拥有较之小型、甚至中型企业更大的优越性，在计划、组织、利用储备、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或新产品等方面尤其如此。因此，苏联大多数都是大型或巨型企业，而小企业，甚至像公共浴室、洗衣房以及理发业则合并成立统一的联营组织，归公用事业部领导。大型化也反映在产品上。苏联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大的挖掘机和发电机，也能生产最大的机床、载重汽车、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但整个工业部门却不重视生产小型拖拉机和小型电站。轻工业产品的品种十分缺乏。几乎每一家大型企业都力图扩大自己的地盘。许多大企业拥有自己的铸造部门或自己的电站。企业本身这种不计成本的做法在整个工业系统中通行无阻。企业还建立自己的社会服务体系，其中包括住宅、幼儿机构和休养所等。全国出现了几百个新城市，其居民生活仅仅同一个或两个大型企业的生产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导致我们国家经济和技术落后的错误的经济政策，当然也不是说在所有领域中都落后。要批判这一政策是很容易的事情。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把苏联经济比作一种有静脉、动脉，但没有毛细管的血液循环系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苏维埃制度具有巨大的动员能

力，国内已经定型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了一整套上层建筑——从国家管理形式直至道德和法律的性质。每一种经济成份都变成了整个制度的一个细胞，而整个国家则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只有一个雇主——完全按照列宁的理想行事的国家——的工厂。这种性质的生产和整个经济体制使几代工人、职员和科技界的知识份子形成了一种顽固而刻板的行为和思想方式，而官僚权贵不用说更是如此。

对我国经济制度产生过影响的，不仅有 19 世纪的思想，而且还有 20 世纪初期的那些条件和思想。共产党是在一个受到并不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孤单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只能最大限度地自给自足，不可能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当然，我们可以从拉丁美洲获得香蕉和咖啡，但是，橡胶制品以及其他产品和物资（从金刚石到铀矿，从牙刷到原子弹）则都得在苏联安排生产。苏联科学同样必须在所有科学领域全面展开研究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在许多商品的质量方面必然会敌不过人家，但是我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由外贸垄断所维护的经济安全。在建成社会主义阵营以后，苏联经济扩大了劳动分工的机会，但是只局限于经互会范围之内。

在我国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观点，对生产的发展和分配、对价格结构以及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不断降低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向居民供应的面包、香肠、药品、公交、砂糖和报纸的价格比西方国家低得多。这样的价格，不是以生产费用为依据的，而是根据社会和政治上的考虑来决定的。房租和公用事业服务费不足弥补国家和市政机构支出的 10%。休养所和疗养院的休假证或者免费，或者只相当于实际价值的 20% - 30%。幼儿园的收费也是十分低廉的。西方旅游者看到苏联的公交收费

如此便宜、向订户递送报刊不收任何费用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尽管苏联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相对低，但他们很浪费冷水、热水煤气和电力，打起电话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又不足以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于是经常出现短缺和排队现象。某些非生活必需的商品也供应不足，且价格十分昂贵。但是，大多数居民由于工资收入较低，对此也不太计较，只不过希望自己的生活能逐步得到改善。还必须指出的是，苏联居民的流动性也很小，许多绳索把他们拴在一座城市和一个乡村、一个企业和一种职业中。

我国过度集中体制的这些弊端，是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来设法克服并得到部份的弥补。不过，这种体制也有不少优点。苏联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有效地集中巨额资源去完成某些重大项目。譬如，在卫国战争年代里，苏联能够比德国更有效地安排各种类型武器的生产，尽管德国可以依靠几乎整个西欧和它所占领的部分苏联地区的经济资源。苏联经济早就着手进行扩大某些企业和部门经济核算制和自主权的尝试，也进行了提高利润这类经济指标作用的尝试。可是，这些尝试往往未能取得显著的成果，也未能改变严格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那些普遍的经营管理原则，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价值规律是不可能起到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的。斯大林早就说过，在苏联，不能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来考察赢利。我们所要考察的是“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及国民经济计划化所保证的，而且要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来进行考察。^①

在 20 世纪下半叶，过度集中的苏联经济的这些优势已开始逐渐消失。苏联在掌握科技革命成果方面已步履艰难，在发展最

① 见《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89 页。——译注

现代化的部门方面已经落后了。改革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这种改革不能仅限于表面的修修补补。我们的体制必须加以变更和改革，要消除它的缺点和畸形，减缓和取缔不合理的集中，对部份国有财产实行私有化。将某些巨型企业划小，同时建立一批以私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小企业，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不合理的生产垄断应该为合理的竞争让路，国家调节方法应该用经济调节方法加以补充，或者加以局部替代，等等。当然，这一切本应是以科学讨论、调研和试验为基础的缓步而稳重的改革结果。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赋予俄罗斯经济以市场所固有的应变力和活力，而又不丧失集中和计划的某些优点。“休克疗法”或者外科手术只能给我国并非一般性的经济和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而取得的成果却微不足道。甚至一般非专业人士也非常清楚，不建立竞争环境，不实行非垄断化，光实行价格自由化和断然放弃原来的集中计划和领导方法，是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市场的。对于原来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来说，“休克疗法”或外科手术只能带来更多的困难，增加生产费用，而它们就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进行弥补。再加上取消了社会补贴，所有这一切就使价格上涨的情势大大超出“价格自由化”提倡者的设想。这正是1992年所出现的情况。

新起的俄罗斯改革者们对于自己活动的性质和方法并没有进行缜密的思考。他们当中那些极端的激进分子曾大声宣称，70年来建立的苏联经济根本无法改革，因此，应该把它拆除。我们可以在某一个“过渡时期纲领”中看到这样的提法：“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世界，都不需要俄罗斯建立的工业”。因此，必须把它完全拆除和摧毁。只有在被摧毁的经济废墟上并在实现“原始积累”之后，才能建立起新的、进步的、符合一切条件的现代工业。为了“建立”和“启动”这样的工业，必须开放俄国的市

场，进口西方的产品，出口俄罗斯的原料。

西方就此提出的建议稍为谨慎一点，但实质上讲，方向是一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来的首席顾问杰弗里·萨克斯把该组织对俄罗斯提出的战略要求称之为“结构修正”。他写道：“俄罗斯已经建立的经济结构是很不健全的。大量的人在一些没有经济活力的企业里工作，他们生活在一些经济上没有前途的地区。如果俄罗斯要克服危机的话，将来就必须对现有的种种劳动活动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改变。”^①

但是，如何和用什么方法来消除俄罗斯的“没有前途的”地区的大量“没有活力的”企业呢？又如何和用什么方法在“有前途的”地区建立“有活力的”企业并把居民安置到那里去呢？

俄罗斯的改革者决定通过“休克疗法”进行快速和激进的改革。他们放弃了国家对价格的调节和国家计划，撤销了几乎所有的专业部，大量削减国家订货或下达的任务。经济开始瓦解了。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政府和总统的不安。叶利钦在《总统笔记》一书中写道：“盖达尔的改革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好转、即摧毁旧的经济。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像做外科手术那样漂亮。相反，却带有某种生锈的吱吱声，当带着肉撕下几块报废了的零件和结构时，则发生了断裂的现象。大概是实在不能换另一种方法。除了斯大林式的工业和斯大林式的经济（使之适用于今天）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别的经济。这种经济生来必然要发生这种断裂——伤筋断骨的断裂。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就会怎样被摧毁。”^② 叶利钦的这番“高论”实在是难以解释。

正如经济学博士 Ю·奥利谢维奇所说的，“耶稣在给人治病

① 《大陆》（莫斯科—巴黎），1991年第89期第205页。

② 杰·萨克斯：《市场经济与俄罗斯》莫斯科1995年版，第9页。

③ 鲍·叶利钦：《总统笔记》第300页。

时，‘一点儿也不会弄伤病人’。而今天的俄罗斯改革者们，看来却以摧毁有病的俄罗斯经济而自夸。他们不是去消除俄罗斯经济中的官僚主义的贪婪自私和因循守旧，不是去给俄罗斯经济增添新的经营精神和竞争活力，他们除了使它“伤筋断骨”地断裂外，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经过他们如此摧毁，我们国家英才的聚集地——科学密集部门也随之被摧毁了，而官僚主义的压制和贪婪的歪风邪气倒空前地泛滥起来了。’^①

在俄罗斯历史上，也就是 1918 - 1921 年的内战时期，也曾发生过彻底摧毁国家原有的经济潜力的情形。但是新经济政策又奇迹般地使工业、运输业和农业从废墟中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当时，俄罗斯整个工业潜力还不很雄厚。新经济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内还保留了千百万个“小业主”，这些人不仅保留有在市场和私有制条件下工作的愿望，也保持了这方面的经营才能。千百万苏维埃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却已失去了这样的愿望和才能。对此可以感到遗憾，但这又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现实。恰恰就是这一现实情况，使得“休克疗法”的改革者们未能把俄罗斯经济摧毁殆尽，否则这就意味着俄罗斯联邦全国人民生存的基础的毁灭。我们根本没有别的经济，没有别的家园，没有别的城市。与其是说人民的积极抵制，不如说是人民的消极抵制，才煞住了，而后来则几乎制止了“休克疗法”在全国的推行。由于害怕出现社会爆炸，克里姆林宫的新贵们才未敢把苏维埃政权时期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彻底“伤筋断骨地”加以摧毁。但是，眼下还没有任何一项明确的、可以循序渐进的政策来替代“休克疗法”。我们的改革者们终究未能克服“材料强度”，于是便开始采取慌乱和笨拙的行动，力图首先保住他们的权力。就连叶利钦本人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

^① 《经济问题》，1997 年第 5 期第 40 页。

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就更困难。”^①

激进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六个年头。当然，变化是有的，但不应加以夸大，尤其对好转的变化更不应加以夸大。我们国家原来的那些大型的汽车及拖拉机工厂、钢铁联合企业、造船厂、煤矿及露天采矿场、铀矿、铁矿选矿厂、油田及石化联合企业、天然气管道、原子能发电站、纸浆及造纸企业以及酒类—饮料厂，今天仍旧在进行生产。但是，这些企业 1996 年的生产状况，比 1986 年或 1976 年要差得多。原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用耕地的耕作情况更是糟糕，如今它们已转变为股份公司或者已经分给了中、小家庭农场。当然，例外情况是有的，但却微不足道。

《莫斯科时报》经济评论员伊琳娜·亚辛娜在 1996 年底写道：“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变化只是出现在货币信贷领域，这对于任何一位比较了解俄罗斯经济改革进程的观察家来说，已不是秘密。如果我们要谈及结构政策，那么俄罗斯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自从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生产变化不大，坦率地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拥有大规模出口产品的企业——工业化初期的俄罗斯之光，依然是那些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开始进行自然淘汰。”^②大家知道，目前淘汰意味着那些不能适应环境条件变化的企业的死亡。就在一部分“民主派”改革者期待着工业化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型工业企业大批倒闭的时候，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提出了一项与政府纲领完全不同的近期和远期行动纲领。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学术秘书德米特里·利沃夫解释说：“今天，我国的经济当中存在着大量的未能发挥效能的、闲置的工业生产潜力。这部分生产潜力占就业人数的 1/4 左右，占现有的固定基金的 40%。由于生产开工率低，对市场信号不能作出适当的反

① 鲍·叶利钦：《总统笔记》第 226 页。

② 《莫斯科时报》，1996 年 11 月 26 日。